

誰是中國研究中的「我們」？

承《二十一世紀》雜誌轉來〈警惕人為的「洋涇浜學風」〉一文，讀後總的感覺是這篇文字的初衷或許是值得肯定的，亦即它似乎是想重新提出「如何才能了解中國」這一問題，但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實際上卻把「如何才能了解中國」這一問題偷換成了「誰才能了解中國」的問題。如此一來，「如何才能了解中國」這一問題突然獲得了某種想當然的解決，因為文章對「誰才能了解中國」這一問題是早有現成答案的，這就是只有作者所謂的「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中國，凡不屬於「我們」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都是「洋涇浜」。整篇文章由此變成了這一自封的中國研究最新最高權威「我們」的宣言，它昭示天下「我們」有如此這般的看法，如果你們的看法不符合「我們」的看法，那你們就肯定錯了。這是既不容爭辯的也無需論證的，因為只有「我們」的看法才是唯一正確的看法，這是因為「我們」具有研究中國的「必備的治學前提，即對於中國現狀的切身經驗」。因此，「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百餘年來歷史主體的心路歷程」，「我們更加清醒地意識到作為今後之歷史主體的運力方向」。儘管「我們」今天尚不能「學貫中西」，但「我們」所具有的「深沉使命感和高遠歷史感，豈是區區陋儒們便能具備的！」

這種力圖以強調「我們」與「中國」具有某種別人所不具有的「根源性認同」(original identity)的刻意努力，一方面固然表達了作者或作者所欲代表的「我們」力圖佔有「中國研究」的強烈欲望；另一方面，則毋寧更反映了作者或「我們」的一種極大的焦慮，即生怕失去對「了解中國」的佔有權的焦慮，生怕「解釋中國」的權利和權力被別人攫取的焦慮。就此而言，這篇文章事實上早已糊裏糊塗地進入了該文作者或許很不喜歡但知之了了的後殖民論述的中心論域，即斯比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謂「誰有權佔有他者性？」(Who Claims Alterity?)的焦慮^①。這位作者如果對當代學術稍有了解的話，本應知道單純訴諸「我們性」(Weness)乃是最幼稚、最笨拙、最不能成立的，因為他將根本無法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這「我們」究竟是誰？中國人民？中國政府？中國知識份子？中國學術界？還是作者的小圈子？

〈警惕〉一文無一處對這一「我們是誰」的問題作過交代，事實上這篇文章的全部高談闊論都繫於這所謂的「我們」之不清不楚和稀裏糊塗之上，因此作者不

〈警惕〉一文的作者如果對當代學術稍有了解的話，本應知道單純訴諸「我們性」乃是最幼稚、最笨拙、最不能成立的，因為他將根本無法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這「我們」究竟是誰？

斷表現出某種「認同混亂」。例如一會兒他全然不知所云地說甚麼「我們更不難欣慰地發現……『世界走向中國』與『中國走向世界』就完全有可能是同步發生的」；一會兒又以生怕別人不知「我們」作過些甚麼的小圈子自許口氣說「正是在這種開放的心態下，才使我們得以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中這樣來平心而論……」；一會兒這「我們」卻又儼然以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口氣宣稱現在「某些作者簡直在故意混淆視聽，一時間在學術界釀成了本不該出現的亂局！因而，面對着這股偏離了『援西入中』之正途，且又敗壞了其聲譽的有害逆流，我們就不得不正襟危坐地清理一番」。顯然，作者連自己都不清楚他和他的「我們」究意是誰。

〈警惕〉一文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認同混亂」之所以必須加以指出，首先是因為這一「認同混亂」實際表明該文作者或他的「我們」至今仍不能夠區分政治權威的命令與學界同仁的討論之根本不同，亦即他們雖然以學者自許，但卻總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想像成政治權威的代言人，動輒就指控他人「故意混淆視聽」、「背離正確大方向」、「製造亂局」或造成「有害逆流」，而完全意識不到這種語言只有十足的黨棍才會使用，絕非學者的語言。正因為如此，該文不是以論證的方式來說明作者或其「我們」究竟有甚麼觀點以及與他人的分歧何在，而是把自己即「我們」想像成對中國研究操有生殺大權的最新最高權威，然後就開始對所有「不屬於我們者」目前關於中國的討論橫加掃蕩，聲稱「我們不得不正襟危坐地清理一番，看看哪些作品只是流露出了無意間的誤解，屬於不期然而然的『洋涇浜現象』，而哪些作品卻竟反映出了成心的作偽，表現出了人為的『洋涇浜學風』」。作者在這裏已是儼然一副「國家書報檢察官」的派頭了。

這位檢察官由此將「不屬於我們者」劃分為「三種人」，第一種人是非中國人但研究中國者；第二種人是中國人但不具有在中國大陸生活經驗的人；第三種人則是以往生活在大陸而後來到西方留學的人。這三種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因為他們都是文章所謂的「洋涇浜」，其中又以第三種人為最壞的「洋涇浜」，亦即文章所謂「人為的洋涇浜」。然而正因為作者乃以檢察官的身分自居，因此他不但沒有而且也不屑與這三種人中的任何一種討論任何一個具體問題。相反，文章的全部目的毋寧是要說明「我們」對這三種人應該採取的態度，基本方針似乎是要團結第一種人，中立第二種人，堅決打擊第三種人。這一基本方針當然是完全符合「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方針的，亦即第一種人是洋人，需要團結以體現「對外開放」精神；第二種人是海外華人，牽扯港台關係，至少要爭取中立；第三種人即留學生則最不是東西，因為他們本吃母乳長大現在卻不認娘，因此必須嚴厲打擊。以下不妨就看看作者的這套「策略」。

對於第一種「洋涇浜」即文章所謂「那些倚靠閱讀外語來窺知其他生活共同體的漢學家」，作者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問題來加以討論，卻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故示寬宏大量地說「我們大可不必對其細節問題採取錙銖必較的態度，因為若從方法論上進行總體的檢討，恐怕海外漢學家的研究工作本來就很難克服如下三種層層遞進的障礙」：即第一他們不可能進入「我們」的生活世界，第二他們不可能領會「我們」的問題意識，第三他們有「刻意求新的弊端」以致他們

作者將「不屬於我們者」劃分為「三種人」，第一種人是非中國人但研究中國者；第二種人是中國人但不具有在中國大陸生活經驗的人；第三種人則是以往生活在大陸而後來到西方留學的人。這三種人都是所謂的「洋涇浜」，「我們」應團結第一種人，中立第二種人，堅決打擊第三種人。

「所想要採納的理論框架越是新穎獨特，就越難以把它們原樣照搬到中國的經驗材料當中」。考慮到這些「方法論」上的障礙，「我們就會更加充滿同情地發現，恰是由於受到了這有色眼鏡蒙蔽，才會使他們越想對中國的發展脈絡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就反倒越會因為把握不準外部社會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而繞入尷尬的誤區」。

簡言之，第一種「洋涇浜」在「方法論」上就不可能達到「我們」的優勢。

至於第二種「洋涇浜」即文章所謂「一些學養很深的華人學者」，作者認為他們「很容易盲人摸象般在中國研究中概括出人言人殊的，甚至勢同冰炭的結論來」。文章以余英時和林毓生為例，認為兩人研究同一對象卻得出相反的結論，這就表明即使「一些學養很深的華人學者當其想要援引新穎的西方理論來了解中國歷史之謎時，往往會「不約而異」地得出彼此抵觸的結論來，從而或多或少地暴露出「削足適履」的痕迹」。此段話相信信任人都會讀得莫名其妙，且不論余英時和林毓生的觀點是否像作者所言那樣彼此抵觸，就算是如此，為甚麼只要有兩方「不約而異地得出彼此抵觸的結論來」就已經證明這兩方都是削足適履了？但作者或「我們」作為最高權威，當然是不需要論證的。相反，他們再次展示寬宏大量地說：「我們在此當然無意細究這兩種說法的孰是孰非，或許它們果真各自對應了一部分史實，正像再變形的鏡面也總還照出幾分影像來一樣。」這等於說瞎子雖摸不到象，象腿還是可能摸得到的。但作者立即強調，象腿畢竟不是象，如果對於同一對象「人們竟可以根據不同的家數而引伸出如此悖反的結論」，那就會讓人感到有如被「推出一排哈哈鏡跟前」一樣不知所措。作者由此忠告第二種「洋涇浜」說，如果「自信憑一己之即便足以在某個問題上給出決定性的解答，甚至聽不進去一丁點善意的忠告，那無非證明了他深陷在泥窩裏不肯自拔而已」。

看來「我們」相對於第二種「洋涇浜」的優勢是在於組織方式上，後者大多各「憑一己之力」，不免「不約而異」，而「我們」則是作者所謂「知識共同體」，因此決不會得出「人言人殊的，甚至勢同冰炭的結論來」。

最後則是作者或「我們」最痛恨的第三種「洋涇浜」即「人為的洋涇浜」了。這種痛恨倒是大可以理解的。因為第一和第二種「洋涇浜」實際只要用一句缺乏「對於中國現狀的切身經驗」，就可以被「我們」排除在「真正了解中國」的候選人隊伍之外。第三種「洋涇浜」則不同了，如作者所言，「這批學者原不應缺乏此一種必備的治學前提，即對於中國現狀的切身經驗」，按理正好可以補第一和第二種人之短，因為中國問題之複雜「難免要構成海外同行必須努力克服的天然盲點，則它本來恰應是中國留學生在國際對話場合中的最大優勢所在：他們本可以憑藉自己的切身經驗來勸戒身邊的漢學家，千萬不要把任何一個哪怕很細小問題處理得太過簡單，以致在左搖右擺的鋼索上失去了平衡」。但是，作者義憤填膺地指出，現在「真正令人痛心疾首又如骨哽在喉的怪異現狀」，恰恰就在於這第三種人竟然一切都和「我們」唱反調而「偏離了援西入中之正途」。如果第一和第二種人和「我們」想得不一樣是由於他們「缺乏此一種必備的治學前提，即對於中國現狀的切身經驗」，那麼這第三種人竟然也和「我們」想得不一

「我們」最痛恨「人為的洋涇浜」，他們一切都和「我們」唱反調，「把原本作為一項公共事業的治學活動，糟蹋成了純屬私人行為的謀生手段」！這幫傢伙出賣良心、出賣人格，因為「他們自度已經可以掉頭不顧父母之邦強盛與否，一心只希圖能在另外的國度裏求得別人的認同」。

樣就只能有一個解釋了，那就是他們已「把原本作為一項公共事業的治學活動，糟蹋成了純屬私人行為的謀生手段」！一句話，這幫傢伙出賣良心、出賣人格，因為「他們自度已經可以掉頭不顧父母之邦強盛與否，一心只希圖能在另外的國度裏求得別人的認同」。

這第三種「洋涇浜」，是在道德上被開除出「了解中國」的隊伍了。

我出國久矣，真無法判斷這篇文章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方式、寫作方式，以致心態情緒在目前國內學界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或代表性。這篇文章不能不讓人有啼笑皆非之感，就在於文章的作者先行設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我們」作為中國研究的最新最高道德與學術雙重權威。但試問這「我們」是誰呢？為甚麼這「我們」可以想當然地就認定自己在「方法論上」不會遭遇海外漢學家難以克服的障礙？為甚麼這「我們」就不會受「有色眼鏡蒙蔽」？為甚麼這「我們」總是能高人一頭地「發現」別人的謬誤？為甚麼只有這「我們」才是把學術「作為一項公共事業」而不會把它「糟蹋成了純屬私人行為的謀生手段」？根據是甚麼呢？

作者在這裏沒有提供任何論證，相反，在他看來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因為「我們」是現在在中國的中國人，因此具備「對於中國現狀的切身經驗」。但這不但不是甚麼論證，而且恰恰反映了作者之缺乏思考和缺乏起碼的現代學術意識，因為他事實上只是在重複一種最流俗的市井觀念，這種市井觀念就是想當然地以為「我們中國人最了解中國」。此種觀念看上去天經地義，實際上卻恰恰可以直接導出這位作者及其「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國的同樣結論。因為根據同樣的邏輯，可以立即推論：最了解工人的是工人、最了解農民的是農民、最了解解放軍的是解放軍、最了解官僚的是官僚。而這位作者和他的「我們」顯然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既不是解放軍也不是當官的，因此當然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的工人、農民、解放軍和官僚。但如果作者及其「我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工人、農民、解放軍及官僚，那他們當然也就並不真正了解中國。不但如此，由於這位作者和他的「我們」不是工人、農民、解放軍，而是所謂的知識份子，因此他們之不能了解中國同樣也是「在方法論上」就有難以克服的「三種層層遞進的障礙」。即第一，他們不可能進入中國工人、農民、解放軍和官僚的生活世界；第二，他們不可能領會這些人的問題意識；第三，他們越是以知識份子的生活世界和問題意識去想問題，就越是與中國的工人、農民、解放軍和官僚格格不入。如若如此，這「我們」有甚麼理由以為自己一定比另外三種人更了解中國？

我在這裏想要指出的就是，一個人如果僅僅因為自己是中國人就認為自己最了解中國，那就像一個工人僅僅因為自己是工人就認為自己最了解工人階級一樣，乃是一種錯誤的假設，並不能成立。可以說，如果人人都像這位作者那樣把「自己的切身經驗」作為排斥他人的根據，那麼所有的社會科學就都不能成立。事實上，美國人類學界近年來確有人認為，西方的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沒有正當性，因為西方人類學從一開始就是以西方人去研究非西方民族，而在這些論者看來西方人根本就沒有資格研究「他者」(the Other)，因此今後西方人類學只能研究白人自己^②。我在這裏無暇討論這一具體爭論，僅僅指出，

作者缺乏起碼的現代學術意識，因為他事實上只是在重複一種最流俗的市井觀念，這就是想當然地以為「我們中國人最了解中國」。如果人人都像這位作者那樣把「自己的切身經驗」作為排斥他人的根據，那麼所有的社會科學就都不能成立。

這種說法如果能夠成立，那麼事實上豈止人類學，而且所有社會科學都將面臨同樣的問題。例如，從事實際政治的政治家完全有理由認為，他要比政治學教授更懂政治，因此政治學研究必然是一種「洋涇浜」的玩意，經濟學當然就更不用說了，因為正如近年來名聲頗噪的前美國《經濟史雜誌》主編麥克勞斯基 (Donald N. McCloskey) 所言，沒有一個經濟學家能夠回答一個「地道美國問題」：「如果你那麼聰明，為甚麼自己不發財？」(If you're so smart, why ain't you rich?)^③更進一步而言，醫學就更不能成立了。因為具有生病的「切身經驗」者明明是病人，而不是醫生，為甚麼醫生有權利給病人看病？

〈警惕〉一文的全部趾高氣揚實際上是來自於作者不假思索地把「我們」和「中國」等同了起來，把「我們」與「全體中國人」等同了起來。確切地說，這位作者似乎連哲學上所謂「所有」(all)與「每一」(every)的區別都還沒有弄清楚。須知「我們中國」或「我們中國人」並不同於「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我們中國」當然大得很、非常了不起，但「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則小得很，沒有甚麼了不起。如果這所謂「我們」是指「我們中國」，那麼當然盡可以說西方的中國研究對「我們中國」至今尚只知皮毛(這其實非常正常，因為任何時候任何研究對象都大於研究者的知識總和，就像數學永遠大於全體數學家的數學知識總和)。但如果說「我們」是指「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及其對中國的了解，那就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西方的中國研究者非常了不起，他們中的許多人遠比無數中國人更了解「我們中國」。更進一步而言，我相信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認為，今天中國的「中國研究」在很多方面落後於西方的「中國研究」水平。大家平常所說的中國學術落後也就是這個意思。這位作者與他的「我們」有雄心壯志，想「學貫中西」，這很好、值得鼓勵，但如果這雄心壯志只不過表現為虛張聲勢地用「我們代表中國」來唬人，如果這學貫中西到頭來其實只不過是井蛙觀天、夜郎自大，那就不能不讓人大失所望了。須知中國研究是人人可以進入的，中國卻不是任何人可以佔有的。我要說的只是，佔有的欲望和「佔有失落的焦慮」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以為只要一味訴諸「我們性」就可以克服焦慮，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又徒招人恥笑而已。

〈警惕〉一文的全部趾高氣揚實際上是來自於作者不假思索地把「我們」和「中國」等同了起來，把「我們」與「全體中國人」等同了起來。須知中國研究是人人可以進入的，中國卻不是任何人可以佔有的。

註釋

①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Who Claims Alternity?", in Barbara Kruger and Phyllis Kagan eds.: *Remaking History* (Seattle, 1989).

② 可參George E. Marcus and Michael Fiske: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③ Donald N. McCloskey: *If You're So Smart: The Narrative of Economic Expert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